

温故知新思未来

——《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文库》代序

吴慰慈 陈源蒸

—

在世纪交替之间,迎新辞旧之际,人们自然地回顾过去,思考未来。图书馆人也进行了研究历史的探索,出版了一些“百年纪事”之类的著作。但所论多较浮浅,未能深入展开。有的甚至叙述失真,结论有误。原因殊多,但史料缺失是其中之一。

由于许多图书馆是在1990年代左右新建的,这些馆不仅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著作未有入藏,就是1980年代的著作也收得很少。包括一些老馆,民国以前的著作亦是不多。所以出现了人们比较多的引用谢拉的《图书馆学引论》、阮冈纳赞的《图书馆学五定律》,却很少引用刘国钧的《图书馆学要旨》和杜定友的《图书馆学概论》,这与谢拉、阮冈纳赞的著作在1980年代出版过中译本,而刘杜二先生的旧作未曾重印有一定关系。因此,多年以前就有不少专家建议加强图书馆学的史料建设。

加强图书馆学史料建设需要做的事情很多,首先要摸清家底,都有哪些资料,这就要有图书馆学专题书目与学术论文索引的编制,而且要有长期维护机制。然后按照对史料需要的程度,选择一些常用的图书期刊重印,重要的学术论文则要按专题重新编辑出版。这些都是非常重要而又极其艰难的基础性建设工作,做起来非常不易。

就以重印旧作来说,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著作(不含相关学科目录学、文献学、情报学)总数有2200多种,当然无须全部重印。但从中选择多少,选择哪些,对所选著作如何评介,都是具有一定难度的。虽然业界学人在2003年就曾在编辑《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时即提出此事,有关人员

也曾多次商量,但终因难度较大而未能启动。但是,业界的需求却一直在催促我们将上世纪的图书馆学著作重印工作尽早开展起来。

到2010年,有人提出了分两步走的想法:第一步先选出一部分著作,原样重印,不作评介;第二步争取申请国家立项,组织专家对所选著作深入比较研究,进行学术梳理。目前先走第一步,这样可以起到保存文献的作用,利于推进图书馆事业史与图书馆学史的研究。经与各方商定,以至今见到的国内图书馆学人于20世纪出版第一部著作的时间(1909年)为上限,以1999年为下限,选择100种左右作品,编成《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文库》予以出版。

为此,首先确定了《文库》的收录范围:以国人在大陆地区出版的图书馆学基本理论、资源建设、分类、编目、读者服务、文献检索、自动化与数字技术应用研究的著作(含教材,不含论文集、工具书、分类法等出版物)为限。相关学科目录学、文献学和情报学的著作一般不收,个别和图书馆学融于一体者酌收。

随后通过各种途径,收集这一期间国内出版的图书馆学著作信息,编成书目。而后根据业界对于这些著作的评价和被引用情况,提出了一份拟选书目清单。由出版社聘请业内专家反复进行讨论,确定了《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文库》的入选书目,经作者同意后,进行编辑出版。在文库编选过程中所编书目也同时附印。这就为做好图书馆学史料建设工作走出了重要的一步。

二

20世纪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虽只是短暂的瞬

间,但在中国却发生了前无可比的巨大转折,经历了三个历史进程:从清王朝末年,产生了民国,又诞生了新中国。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学技术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具体在图书馆领域,机构主体从藏书楼,到近代图书馆,到电子图书馆;阅读对象的物质形态从雕版印刷的线装书,到铅活字印刷的现代书本,再到电子出版物;书目记录从簿本式,到卡片式,到机读式;读者服务从劝人读书,到限制发证,到多馆通用一卡通;图书馆规模从几十、几百个,到几千、几万个,到几十万;办馆理念从私家藏用,到对社会开放,到全民自由阅读。所有这些变化,都被记录在这一期间图书馆学人的著述之中。这些变化有何历史意义,对今人有何启迪,对未来有何指津,当有待今日图书馆学人去认识,去思考。

图书馆是社会的一部分,图书馆学研究也是认识社会与社会认识的一部分。无论是图书馆事业建设,还是图书馆学研究,都与社会(图书馆的生存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

认识社会是从图书馆事业的变化与图书馆学研究的发展,看到社会的进步、社会对图书馆产生的作用力。

社会认识则是从图书馆事业建设规模与图书馆学研究深度,折射出图书馆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对社会的反作用力。

图书馆是社会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图书馆学在研究如何推进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时候,必然要研究如何推进整个文化事业的发展,进而会思考如何推进整个社会的发展。

图书馆学是社会科学属性,也就充满了社会科学的人文精神。图书馆学又是实用性很强的学科,因而又有图书馆技术的研究。

对于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图书的发展变化,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的发展变化,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都需要我们认真整理、出版和研究近百年来图书馆学著作,这是不言而喻的。

百年沧桑,在图书馆学著述中,不可避免地会留下时代的烙印,这是我们在研究这一时期文献时

需要注意,也是可以理解的。

三

图书馆学的研究,不断从其他学科成果中吸取养分,以推进本学科的发展,这是被图书馆学人所认同的。但图书馆学研究的成果,也对其他学科产生相应的推动力,人们在这方面,认识显得有所不足。

虽然,图书馆学研究的是发展图书馆事业的基本理念和办好图书馆的具体技术,但这些理念和方法对其他学科,以至对整个社会,也有着积极意义。

以分类编目而言,其他学科也有分类的研究,但以图书馆技术研究最为深入,成果最为丰富,对其他学科的分类研究有很大的影响力。而编目则更是图书馆独领风骚,其他学科对编目的处理基本上采用的是图书馆技术的成果,互联网上各种元数据处理技术,无不源于文献编目方法。

文献检索方法的深入研究与文献检索教育的普及,是知识传播末端对前端反馈的典型表现,前者是搜索引擎设计的基本原理,后者是互联网在我国迅速普及的用户基础。

资源共享是图书馆学研究着力较多的方面,如今已成为全社会普遍使用的关键词。

以上所述,在1909—1999年期间的图书馆学著作中都有所涉及,在本文库的作品中,程度不同地进行过讨论。因此,文库对于研究图书馆学在科学发展中的普遍作用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四

对于图书馆学研究的发展,有各种各样的描述。国际上有不同流派,国内则是许多“说”,从而对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形成不同见解。

但是有一本书可能被忽略了,在2200多种图书馆学著作中,以图书馆学为书名的,包括概论、通论、新论、要旨、基础、讲稿等,有上百种,而以图书

馆技术为书名的只有前苏联青年图书馆学家克连诺夫《图书馆技术》一种。作者在自序中写道:是按照克鲁普斯卡娅所说“很多事情,如图书馆的保藏、最大限度的使用图书财富、满足读者的需要,以至图书馆的政治面貌,都要取决于图书馆技术问题”而编写该书的。

科学技术包含有科学与技术两个层次,科学是理论研究,探索学科的自然规律;技术是由自然规律转化而成的知识与方法。

研究图书馆发生、发展的规律,是理论研究,属于科学的范畴;而研究办好图书馆的具体方法,应属于技术范畴。

这样说来,把图书馆学科分为图书馆学研究与图书馆技术研究两个层次,是否比分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两个层次要好一些。把两个层次的事情,放在一个大的体系中,总是不太好展开。

比如,提倡图书馆学走出图书馆的“理念学派”,批判对图书馆技术方法的研究是经验主义,而众多图书馆实际工作人员又批判“理念学派”是脱离实际的空话。这是由于把两个层次研究的内容放在一个范畴内讨论,说的不是一回事。

再如,无序资源的有序整合,是图书馆技术的核心概念。但若以此作为图书馆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点,则又不妥。这方面应当怎么认识,在已有的论著中有不少说法,需要在各方专家广泛讨论的基础上进行梳理,形成共识。在这方面,文库的

出版显然是很有意义的。

五

1909—1999年期间,图书馆学著作出版总数,按已有书目统计共2266种。其中晚清末年4种,民国时期782种,新中国成立后1480种,出版数量分阶段计算呈上升趋势。从分年代的统计看,发展是不平稳的。若画成曲线分布图,既有高峰,也有低谷。的高峰期为1920—1930年代与1980—1990年代;低谷期为抗战前后与“文革”前后。

高峰的出现,是在社会处于经济、文化发展时期,是图书馆人努力的成果。低谷则不是图书馆界与图书馆人的自身因素。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图书馆学著作出版数量急骤下降,出版单位与书稿被毁无数,至1945年后方有复苏。日本侵略者对于中国图书馆学著作的出版,甚至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破坏都是毁灭性的。

“文革”前后有16年图书馆学著作的出版数量为“0”。这16年对我国图书馆学著作出版的破坏性影响,比之抗战8年的破坏还要严重。这不仅是图书馆人的悲剧,也是整个国家与社会的悲剧。我们在研究历史时不能忘记这一惨痛的教训,并且永远不要让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

吴慰慈 北京大学资深教授。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邮编:100871。

陈源蒸 中宣部出版局离休干部。通讯地址:北京东厂北巷4号楼553室。邮编:100086。

(收稿日期:2012-12-21)